

Articles

Conferences  
& LecturesResearch  
Activities

# 近代中国研究班· “关于环境治理和传统社会 在现代与当代中国农村的历史研究” 共办学术研讨会

日 時：2014年2月23日

場 所：東洋文庫

## 序 言

内山雅生

(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班总括)

本次研讨会是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班(简称“近中班”)与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A的“关于环境治理和传统社会在现代与当代中国农村的历史研究”小组(以内山雅生为首席研究员;简称“科研小组”)共同主办的。该科研小组是由近中班成员之中农村社会研究的人员组织,从社会环境变化的角度,研究了在中国各地的农村社会。如近中班已经作为其成果出版了《华北的发现》,进一步分析了在中日战争之前和之后日本人研究的中国社会,而一直追求对于中国认识的真实情况与其变化过程,目前将其研究领域从中国北方到中部与南部拓展。因此,在科研小组邀请的张利民、侯建新以及张文明三位研究者报告的基础上,与近中班的成员研讨,决定要更澄清现在高度重视的中国社会研究课题而实现进一步的研究进展。本报告的内容是与战时日本举办的调查以及最近的重新调查、张利民氏的华北市场结构、侯建新氏的冀中农村的教育问题以及张文明氏的上海女职工劳动三篇报告综合研讨。虽然参加的人少,但除了近中班与科研小组成员外,另有其他研究者参加研讨,本研讨会的成果可以说是给东洋文库近中班的今后活动很大的研究提示。

## 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述评

张 利民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方一带之商业市场,咸以市集为中心,虽有城市及市镇之商店,但平日商业,多甚清淡,必遇逢集之日,市面乃形繁荣。”通过集市“可觐该地商业发达与否”,“可察知该地有何特产”,“可察知其地人民之生活状况”。因此,在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中,集市(镇)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既有成果而言,关于近代华北集市(镇)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30年代。但在此后的数十年中,除日本学者加藤繁、石原润、中村哲夫等人研究较多外,中国学者的研究一度走向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再度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些较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但与江南市镇的研究相比,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在已有的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更加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本文采取“专题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分类方法,力求突出重点,更加全面,亦可从相邻时段、相关主题研究中借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文所谓的专题研究,是指直接以近代华北或华北范围内某些省份、县份所属集市(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其中,问世较早,较具系统性和研究性的研究成果,当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20世纪20年代末所进行

的关于清河镇社区的调查研究和杨庆堃 30 年代所做的关于山东省邹平县市集的研究。此后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近代华北集市(镇)的问题,譬如石原润、中村哲夫、宓汝成、张瑞德、刘克祥、乔志强、龚关、李正华、王庆成。

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近代华北集市研究向前迈进了大一步。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关于近代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集市的研究亦渐次展开。如李金铮、贾贵浩、谢元鲤、行龙、张万寿、魏宏运等。

正如有学者多次强调指出,集市在华北区域市场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华北区域市场发展迥异于江南地区的一个特点。因此,近代华北集市理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华北市镇的发展也有其独特之处,其中之一,便是铁路的开通极大地影响了市镇的发展。而在铁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市镇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大、中、小城市和县级行政机关驻地。因此,铁路与市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学者们研究近代华北市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华北区域史、社会史,尤其是铁路与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迁研究的深入,一些关于铁路与近代华北市镇发展的专题论文相继问世。例如江沛、熊亚平、王先明的文章。

此后,熊亚平等人推出系列论文,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其一,分析了铁路与华北传统内陆工商业市镇兴衰和市镇形态演变之间的关系;其二,从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属性和与铁路相关的运营管理制度出发,考察铁路沿线城镇的铁路运营管理机构与城镇形态演变之间的关系,以及路货运负责制度、联运制度等各项制度组成的铁路运营管理制度对其转运业发展的影响。其三,力求突破铁路与市镇发展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转而将“铁路沿线市镇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了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和市镇商会会员等问题,阐述了铁路沿线市镇发展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与以上研究者不同,王玉茹、张学军、丁德超等人从其他角度对近代华北市镇作了研究。

关于近代华北集市(镇)的研究,一方面在集市数量与集期以及铁路与沿线市镇发展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与明清和近代江南市镇研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又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集市与乡村经济、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份量的成果仍不多见。其二,既有研究虽然也重视但其个案或为某些县份所属的集市和市镇,(如位于铁路沿线)的一组市镇,更具体的个案研究,除石家庄等少数市镇外,个案研究或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类型的研究亦不多见。其三,比较研究仍然较为薄弱。

结合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有的学者对近代市镇研究的总结,我觉得今后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

首先,应致力于转换视角、扩大研究视野。以往关于集市数量、集期,以及与铁路关系的研究,虽然抓住了近代华北区域的两大特征,但视野也受到很大局限。近代华北集市(镇)的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应将其置于华北区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社会变迁进程中进行考察,以“超越集市和市镇”。

其次,应致力于更新研究方法。一方面,要深入系统的学习和运用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不能仅停留在一知半解和转引借用的层面,真正做到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另一方面,要“走出华北”,学习和借鉴江南市镇研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在完整准确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华北区域市镇发展状况与特征。

再次,应致力于跨时段的研究。一方面,应重视明清时期华北集市(镇)由于经济兴衰、人口增减和军事防御,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的发展变化,注重其发展的和延续性,尤其在涉及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历史的积淀和惯性。另一方面,应将近 60 年华北集市(镇)的演变纳入研究的视野,既可以了解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变异,也可以分析市场经济进程加快后的适应与不适应;既可以检验研究成果与结论的科学性,也可以为当前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历史依据与借鉴。

第四,应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拓展。一方面,应努力开展关于集市(镇)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社会生活方式嬗变之间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应努力扩大个案研究,尤其是关于若干名镇历史变迁及其影响

的长时段的研究。

第五，应致力于资料的发掘利用。与江南相比，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的瓶颈之一，便是资料尤其是方志资料相对不足（如镇志、乡志等较为少见），因此，更应重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口述史料、调查资料和碑刻的发掘利用。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的“乡村建设派和日本的“满铁”等机构大量的调查资料。

## 民国年间冀中农村教育研究

侯建新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至今仍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也是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本文主要根据陈翰笙等老一辈学者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回顾与分析民国时期特别三四十年代冀中乃至华北地区的教育状况，从历史的角度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人口与教育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先简要说明人口的变迁。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大致状况是这样的：清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人口剧增时期。明代人口只有六千万上下，清代康熙以来人口大幅度增长，1700年人口首次达1亿左右，18世纪突破3亿，19世纪已达4亿。自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时有浮动，但在总量上变化不大。本文所研究的民国时期即20世纪上半叶人口即属于这种情况。

从陈翰笙先生1930年的调查记载以及河北省统计局对40年代的追踪调查记载看，基本符合上述总的概况。从1930—1946年十六年间，清苑的人口增长不快，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缓慢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7—9.5%之间。

冀中同国内大部分地区一样，民国初年到30年代，很多村庄仍未设立小学，私塾仍然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1932年，保定地区“全境四五百村，而未设立学校之村庄，竟达十分之三四，女小尤寥若晨星”。即使设立小学的村庄，往往同时也保留私塾。在整个华北地区，私塾教育在农村都有很大的市场。根据1935年的一项统计，冀鲁豫三省共有351个县，平均每县有私塾48所，塾师48人，学生735人。考虑到当时很低的入学率，显然这还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在冀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教会学校往往成为现代小学的先导。

在教育方面对村民有普遍影响的事情，还是村办学堂的兴起，它们是现代小学的前身。村办学堂，一般都是在私塾的基础上，以庙宇改造为学堂，被老百姓戏称为“中华民国大改良，以大庙改学堂”。

当时清苑的县城在保定，保定也是直隶的省府所在地，又临近京城，固此得兴办新学的风气之先。清苑的劝学所于1906年成立，这是袁世凯办学机构的县一级称谓（1923年改称教育局）。劝学所设总董一人，下有劝学员六人，分赴各乡镇，督促建立小学堂。1908年时，全县的初级小学已达150余处，并把这些小学划为五个学区，每学区又设高等小学一处。初等小学学制4年，高等小学3年，初小4年是义务教育。现代小学开始普及时，缺乏师资是主要问题之一。为提高现有教师水平，劝学所组织初等小学老师和私塾塾师，分期分批来县城参加讲习班，进行培训；最后，为长远计，1923年正式创办清苑师范学校（1931年改称县立乡村师范学校），为新兴的乡村小学提供师资。师范生多数来自农村，毕业后又回到农村，担任高小和一部分初小教师。该师范学校先后为清苑培养了数百名乡村小学教师，是当年全县的教育中心。

笔者颇感兴趣的发现了一张教师花名册，这是该师范学校教职员1938年的登记名单，从中可对该校的师资构成、课程设置以及教职员工的报酬等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考虑到该校当年师范生每月2元钱的伙食费以及当地一般村民的消费水平，应当说清苑教师的这份待遇还是不低的。

到1932年，除在保定设县立师范学校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外，还在乡村的共建12所高等小学校，两个班，学制改为二年。多数是走读生，住宿生仅占10%，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年龄较高者达20岁。教师由县统一分配，教学经费、教师薪金，一律由县拨款。学生除书费、伙食费外，全年还交2—4元学费。